

政大的誕生與成長

(本文插圖刊27、28頁)

羅家倫

訓練培植革命幹部

當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打下南京以後，全國青年的心理激起了洶湧的狂潮，這股革命的主流雖然屬於中國國民黨，但是共產黨潛伏的力量和滲透的工作，亦蔓延到各地，所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佈清黨的時期，認為培養和訓練青年幹部以充實革命的主流，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中央黨務學校的設立，就在這個時期開始。

民國十六年五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創設中央黨務學校的議案，同時就派定了九個籌備委員，名單所列為蔣中正、胡漢民、戴傳賢、丁惟汾、陳果夫、吳倚滄、曾養甫、劉蘆隱八位先生，其中還有一個我。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是在南京鐵湯池丁園，也就是當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轅裏開的。第二次會議就推定了蔣中正先生為校長，戴傳賢為教務主任，我為副主任，丁惟汾為訓育主任，谷正綱為副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吳挹峯為副主任，旋經由中央通過任命，並草就校章，其重要規定中有一個校務會議，以校長為主席，以各處正副主任為委員，校

長不能出席時以教務主任代理，決定重要政策，亦經中央通過頒行。當時就向停頓中的東南大學商借一部份校舍，包括南高院鐘樓、體育館、教員宿舍、田字房學生宿舍，和後面的梅庵與操場。自此籌備會議就常在梅庵舉行。在這裏決定了招生章程以後，我和戴先生因同住丁園的關係，費了相當時間商量考試的科目，出具試題，並商訂應開的課程及每項課程內容的提要。接着在體育館舉行第一次學生入學考試。因為戴先生公務較忙，於是學校教務的責任，我不得不多負擔一點。我當時確定兩個主張：一、選聘教員首以學識為重，決不講情面。二、選拔學生應以成績為準，決不憑保薦。第一次招生考試的結果，因標準過高，人數未曾招足，於是決定再舉行第二次招生。

在圍城中弦歌未輟

正在一次錄取學生入學之後，第二次招生未舉辦之前，國家出了一件大事情，就是因為寧漢分裂致徐州軍事因此受到挫折的結果，逼到蔣總司令為求團結而辭職。我記得還很清楚，就在下

野那天，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早上，我選到他丁園辦公室裏商討校訓問題，他最後決定用「親愛精誠」四字。我雖然知道時局的緊張，但是沒有想到他就會下野。正值下午六點鐘左右，陳布雷先生（那時他以客卿資格在總司令部擔任重要的文字工作）要我到他房裏去商量一個文告。

我一看乃是下野通電，吃了一驚。我和他斟酌了幾處文字，即回黨校，略加部署，中夜回到所住的丁園。那時候蔣先生已上火車離京了。八月二十五日孫傳芳部隊的主力，約五萬多人渡過長江，攻打龍潭，切斷京滬交通，南京的局勢緊張萬分。當蔣校長離開南京的時候，留下一個便函給我，要我代理黨校校務會議主席。那時候戴、丁、陳各位先生也一起離開南京了，在校負責的人祇有我和谷正綱、吳挹峯兩位先生，但是我決定方針，使已入校的學生照常上課，第二次招生考試仍繼續舉行。居然在緊張混亂的期間，這個學校仍做到弦歌不絕。其實我們雖有最後的決心，但也有相當的佈置。就在京滬鐵路交通斷絕的前一日，我去上海與陳果夫先生商量，籌了一萬三千元，於當晚乘夜車離滬，次晨回到南京，交與

抱峯先生保管，那天晚上京滬鐵路已被切斷。以後我幾乎每晚都到何應欽總指揮在城內門鷄關的公館裏，參預軍事會報，準備萬一南京在不得已情況之下而撤退時，我們帶領全校學生編成的一個大隊，隨軍隊開拔。在圍城中招來的學生，革命性都是很強的，這一點，我們都可以相互信賴。

遴選學生隨軍北伐

到了寧漢合作以後，南京的政局大有變動。黨部由中央特別委員會主持。政府由國民政府委員中推三位常務委員主持。特別委員會的主持人物中以西山會議派的人較為當權，氣量不免褊狹，對黨校常以另眼相看。黨校的學生對於他們自然也有不滿的表示，於是發生了一次所謂「一二二」慘案，學校幾被解散，幸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蔡元培、譚延闓、李烈鈞三先生因已往的關係，常常和我有所接觸，得免遭遇解散的厄運。最後寧漢合作全部成功，蔣先生復總司令職，回到南京，學校也就恢復了正常的軌道，不久遷到紅紙廊的校舍。

蔣先生復職不久，就從事第二次的北伐，要選派一部份學生隨軍北伐，擔任前線的政工和民衆工作。被選拔的約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有十個以上的女生。我就在這時期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戰地政務委員，並兼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教育處主任，隨時處理克復地區的教育事宜（蔡公時先生以同樣資格兼外交處主任，濟南事變時我們同在一起，他於夜間被蠻橫的日軍蓄意戕害），同時我

也可以順便指導被派遣的隨軍學生，一直到北平克服為止。

改稱中央政治學校

在此地我要補敘幾句話，就是黨校第一期學生受教育期限，最初祇定為六個月。我認為太短，繼續請准中央延長了二次，第一次三個月，第二次又是三個月，所以第一期學生實際受教育期間，大約是十一個足月。

北平克服以後，我回到南京，仍然處理校務，可是出乎我意外的，政府並未於事前徵詢本人意見，就發表我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在北方初定之時，中央認為我有前往文化古都的必要，我於是乎去了。可是我在黨校的職務並未解除，由段錫朋先生代理了一年。以後到十八年，就改稱為中央政治學校了。校長之下，設有教育長一人，由丁惟汾先生擔任，教務主任由余井塘先生擔任，我改任為校務委員（同時另定校務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中央任校務委員五人，有丁、戴、陳、和我）。十九年七月，馮閻叛變，同在精衛在北平組織擴大會議，反抗中央，這個局面已使我非常尷尬。更有一件說來可笑的事，當時適逢清華理學院物理系薩本棟教授向美國買一架新發明的收音機，裝在科學館的實驗室裏，樓頂架了二根天線，那些土包子就說我同南京秘密通電，派軍警來搜查。閻錫山並且還派了一位山西籍的清華畢業生喬萬選為清華大學校長，煽起學校的波瀾，企圖接收，於是我不得不一面報告中央呈請辭職，同時秘密轉道天津乘海船南下，回

到南京。不久和戴季陶先生同到柳河前線勞軍，日擊當時中原戰爭的激烈戰況。

戰爭結束以後，中央仍舊要我回清華大學校長本任，我堅決不願意再去。為了表示不去的決心起見，於是接受了武漢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聘書，重理教書的舊業。剛剛安定下來，忽然接到蔣先生的電報，要我回南京擔任中央政校的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我懇切的電辭，蔣先生又電武漢大學王世杰校長促我回京。王校長拿了這個電報很遲疑的和我說：「我真不知怎麼辦？為了武大，我希望你留下，但為了中樞的關係，我又不能阻止你去。」我於是祇得回南京，再在政校服務。

朝向高等教育發展

這次我回政校的時候，立定主意要實現一項主張。我向來不相信短期的訓練，尤其是以這種訓練，給予在應當受完整高等教育時期的青年。當十八年改制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時候，我曾參預會議，極力主張把政校改為四年制的大學，那次未能通過，採取了一種折衷的辦法，將名稱改為中央政治學校，教育期限定為二年半，其中二年是上課，半年是實習。我這次回校，復力陳長期而充分教育的好處。經一再討論，才決定為四年制，每個學生前三年實在校攻讀，到四年級第一學期分發到與他學科有關的機關去實習，並且蒐集論文資料，第二學期仍然回校，除了上少數未讀完的功課外，就是討論、研究和寫論文。以學生在學期間而論，已經和其他大學一樣，功

課的嚴格也不亞於其他的大學。可是中央仍有人主張不必用大學名義，以免除受若干法令上的拘束，於是我建議在中央政治學校名義之下，設置大學部，為政校的主幹。我希望把這個學校辦成像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L'É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相似的標準。倫敦政治學院學術的水準是世界所公認的。而法國政治學校，更在普法戰爭之後，出了許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復興了法國的第三共和國。這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我認為真正的人才，決不是粗製濫造的出品，我認為清末民初日本式的速成法政和速成師範，害了中國的政治與教育不小，任重道遠應該是我們訓練的目標。我為了想同時要求融合上述二個學校的優點，而且使其適合中國當前的需要，所以把大學部分設政治、外交、經濟等若干系，系的下面到三年後再分組，以培養實際的專才，而且表示與一般大學在重點上的區別，當然政治學校為了改革當前的政治，是要偏重在實行方面的。

確立雪恥圖強基礎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全國學潮風起雲湧，要逼政府立刻對日宣戰。那年多初到南京來請願的各地學生，同時多到五萬人以上。政校的學生同是愛國的青年，自然也不免受這潮流的衝激。當時我日夜在校，就以這個遠大的目標來勉勵他們。我記得九一八的消息傳到以後，大學部在

校的同學蕭乃華、蕭自誠、周異斌、劉支藩、徐志明等一大羣青年們都痛哭流涕到我辦公室來，要到前方去拚一死活。我當時告訴他們，抵抗強敵不是趁一時之憤、匹夫之勇可以成功的，我們先要能沉着氣，分工合作，找着敵人的對手方來抵抗。我為中央政校叫出一個口號就是：「從革新政治為雪恥圖強的基礎」。當年政校有一個藝術幹事莫萬章先生，為這句口號印製成一份標語，在頂上畫了一隻大獅子，面型畫得有點像我，用爪子在撕碎日本國旗。我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好笑。但是在那次洶湧的學潮之中，政校學生竟能做到以堅決的意志，征服衝動的感情，始終不曾附和羣衆出外遊行，這決不是校規和壓力所能做到的。我在大學本科同學的訓練方式中，還實行了一種特殊的苛政，就是除了本系本組規定應修的課科外，另行分別指令各年級每人在每學年要讀一種中文的名著和英文的名著。我還記得規定為一、二年級學生所應讀的書是全校一致的：初次規定一年級中文必讀的是「曾國藩家書」，英文必讀的是「佛蘭克林自傳」（B. Franklin's Autobiography），二年級中文是胡林翼的「讀史兵略」，英文是查恩渥德的「林肯傳」（Lord Charnwood: Abraham Lincoln）。到三、

四年級，中文指定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英文就各按系別而指定了。我記得政治系的是白萊士的「近代民主政治」（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二大本（其餘我記不清楚了）。而且每種讀物都指定的有教授擔任指導，為學生解釋疑難的地方。每學期均要加以考試

，考試的評分，在各學科積分中占很大的比重，可以影響其升級與否。我所以實行這種苛政，最大的理由就是認為一個將來要在學問事業方面有成就的人，如果一生不讀一兩本有系統的大書，將來臨事胸中就會沒有主張，思想亦會缺少條理。我們不要忘記，那時候小冊子的風氣很盛行，這個我是反對的，我認為天下的大道，決不在小冊子上。必定要受過偉大著作的陶冶，才能鍛鍊卓越的見解和受得了重大的擔當。而且一個生在現代的青年，如果不努力把至少一種外國文字學好，能有閱讀和了解的自由，則將來會感覺到很難應付當前若干重大的問題。

縣政實驗成績不錯

為了使他們所學的功課能夠有真正的實驗的機會起見，在我回校以後，大學部第一期學生畢業時期，辦了二個實驗縣，一個是江蘇的江寧縣，一個是浙江的蘭谿縣。辦江寧實驗縣的主動是校長蔣先生。他有一次同我說：「在南京城裏許多現象，已經看不順眼了，到了離城幾十里的湯山附近，更不像樣子。本校何不拿江寧縣來做實驗，把他辦好呢！」於是我和陳果夫先生去和江蘇省顧祝同主席商量，把江寧縣作為實驗縣，以為將來推廣和改革縣政的參考。他亦欣然同意。組織了一個縣政委員會，由顧主席擔任委員長，陳果夫先生任副委員長，實際上主持的是政治學校負責的人們，我自然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開辦之時，選了三十個大學部畢業生，擔任該縣各種縣政的工作，並深入鄉村。舉辦以後，確

實做了很多顯著的興利除弊的工作。後來又在浙江選擇了一個地方雖不富廣而為交通樞紐的蘭谿為實驗縣，縣長為政校法律系主任胡次威先生。校方也撥了幾十個畢業生去工作。在這縣辦事的艱苦過於江寧，而實驗的成績，並不亞於江寧。可惜不久抗戰發生，這兩個改革縣政的試驗場，均被日軍佔領，推廣更說不上了。

除此以外，在這時期中，還設立了三個附屬學院，就是地政、計政和合作。這三個學院，都是為適應當時政府的需要而設置的，其籌措經費，俾能成立的經過，尤賴陳果夫先生的贊助。這也是應該提到的建置。講到整個政校的建設和經營，我最不能忘記的是吳挹峯先生，從創辦時間起，他同我共事的時間最長，他忠實的態度，刻苦的精神，貢獻給學校的，實在很大。

培育各地邊政人才

大概是由於我在少年時代就發生了一種對邊疆的興趣，使我對邊疆教育感到熱心。在黨校時期為了培植邊疆青年，曾經辦了一個蒙藏班，後

來在和平門外曉莊地方改建為蒙藏學校。在九一八前後，我更覺得這種教育機構的擴充，對國家是一種迫切的需要。由於我的主張和蔣先生的核准，陳果夫先生的贊助，除本校的蒙藏學校之外，在五個邊區地方，辦了五個分校。第一個在綏遠的包頭，是為了解內外蒙古青年求學的方便，第二個是在甘肅的酒泉，這裏是河西走廊的要地，可以招收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帶的蒙藏青年，第三個是在青海的西寧，為了招收青海的美藏蒙各族子弟，第四是西康的康定（打箭爐），以容納川康邊境各族的青年學子，第五個是在雲南的大理，為了教育西南直到緬越邊境各族的青年。這五個地區，無論在民族、戰略、經濟各方面，我認為是選擇得最適當的。我在民國廿五年十一月月初收復百靈廟的戰事開始前幾天，前往綏遠的包頭視察這個蒙藏學校的分校，看到三百多個體格雄壯的蒙古學生，穿了政校的制服，佩了政校的校徽，用他們自己組成的樂隊在沙漠邊緣來歡迎我。當軍事即將發動，邊區極端緊張時期，突然看到這許多體魄健旺、誠心接受國家教育的青年，

真感動得幾乎流淚。以後我到酒泉、西寧、大理各處去視察，也有類似的情形和感覺。

我擔任中央大學校長以後，仍舊兼任政校的職務約三年之久，後來因為責任太重，精力有限，我力請辭去二者之一的職務。我最初是請求辭去中大職務的，有一個晚間我在軍官學校校長官邸應蔣校長之召同葉楚傖、陳果夫兩先生一共四人便餐，我懇切陳述辭去一處職務的必要，並表示辭中大校長的意願，但蔣先生認為中大情形複雜，正在上軌道的時候，未能答應，所以當晚也沒有得到結論。過了一個多月，我又以此為請，才准我辭去政校的職務，改任為校務委員，一直到復員之後改為國立政治大學為止。到了臺灣以後，我還在政大研究所教過二個學期的書。現在回憶前塵，頗有白頭宮女重話開天遺事的感慨，可是看見從黨校、政校到政大畢業出來的許多同學，不乏卓然有所建樹的人才，又使我從回憶中愈感覺到凡是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們，對於教育事業，仍然應該保持堅強的信心。（摘自政大校友通訊）

聖文 少年 行 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眾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